

h.106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辑

(总第五辑)

85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蚌埠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飞向新中国·····	沈济世 (1)
李席儒追忆1925年留苏前后·····	侯鸿绪 (23)
回忆我和徐悲鸿先生的一段交往 ·····	杨素冰口述 辛有光整理 (32)
在“中央训练团”受训一月记·····	刘 震 (37)
国民党第一任蚌埠市长李品和·····	傅华昌 (55)
夏威在蚌埠·····	绍 恒 (64)
新桂系接收蚌埠琐忆·····	陈雁峰 (73)
桂系第七军在蚌劣迹二三事 ·····	吴仲伦口述 闻鹏整理 (78)
为妇女同胞解除病痛四十年——记名老中医臧守琛 ·····	陈兴炎 (81)
黎华庭和蚌埠商会·····	王端骧 (89)
一起军阀与土匪抢劫银行金库的大案·····	隗启明 (93)
解放前蚌埠煤炭业的兴衰·····	刘合瑞 (98)
淮上菜和淮上菜馆·····	季 之 (103)
金山饭店·····	陆 文 (111)
江淮话旧·····	肖识真 (123)
怀远县“五·八”学生血案始末 ·····	怀远县政协办公室 (130)
蚌埠的游艺场·····	冯淮南 (136)
天桥下的影剧院·····	宗趣之 (152)

解放前蚌埠京剧场所记实·····	王树培 (159)
京剧清唱茶座·····	淑 佩 (171)
蚌埠京戏“票界”轶事·····	王 公 (173)
我所知道的李虎臣·····	胡承弼 (180)
蚌埠市政协文史资研究委员会征稿提纲 ·····	(183)

飞 向 新 中 国

沈济世

四月九日，这个日子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很平常和微不足道的，而对于我却是终身难忘，因为这一天，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，是决定我生与死进行搏斗的一天！我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九日下午四点钟，我和同伴们驾驶一架美制C—46大型运输机，由国民党统治区飞向新中国……

一 心 找 党

一九四四年初，我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，在昆明接受三个月的入伍训练后，调往印度的拉合尔进行初级飞行训练，秋天正式前往美国航空学校学习，地址是在美国的洛杉矶等地，学习时间两年。

在美国航空学校学习期间，我结识了同班同学张镭（原名张玖荆），张个头不高、微胖，为人正直诚恳，热情豪爽，在同窗学习中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和报刊，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效祖国的决心使我们建立了诚挚的友谊。

我们虽然身居国外，但对国内的时局却非常关心。当我们从报纸上获悉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，又公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，无不义愤填膺！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我

们从中文版《华侨日报》上看到一则新华社的报道：“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为了反对内战，驾驶B—24重型轰炸机一架，首举义旗，飞往延安”，我们都受到很大启发，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。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，希望我们自己也有这么一天……

一九四六年底，我和张镭在美国航空学校学习期满，回到国内，被分配在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（空运大队），该大队下辖四个中队。101中队驻在上海；102和103中队驻在北平；104中队和大队部驻在南京。张镭分在101中队任领航员，我分在南京104中队任领航员并兼任大队部一课人事参谋，后来，又打到二课兼任情报参谋。我们虽分在沪、宁两地，不能像在美国航校学习时朝夕相处，但有时候，他执行任务飞来南京，或者我执行任务飞往上海，仍有很多见面的机会。每次相见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谈论起时局问题。当时国内的情况是，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，内战的危机日益明显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。国民党这种违背民心的倒行逆施，激起了一切正直的爱国人士的不满和反对，在国民党官兵中也滋长、蔓延着强烈的反战情绪，不少人向往解放区。我和张镭曾多次商量，我们绝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参与内战，做蒋介石的帮凶，并且相约一定要想方设法寻找共产党，参加革命，以便早日摆脱黑暗，走向光明。

有一次张在上海与中学时代的老同学、浙江同乡郭子占邂逅相遇，郭在国民党空军总部新闻处任职，老同学见面，真是有说不完的话，从个人情况谈到对国内时局的看法，两人愈谈愈投机。谁知郭是共产党派在国民党空军中的地下党员，以后经过多次交谈，郭子占介绍张镭与上海地下党的王

月英同志相见。

张镭同志找到上海地下党之后，积极要求去解放区为建设人民空军服务。王月英同志认为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党需要在国民党空军中争取尽可能多的飞行人员驾机起义，以瓦解或削弱国民党空军的战斗力，支援解放战争。因此，要求张留下在国民党空军中开展策反工作。经过党组织的教育，张终于提高了认识，安下心来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，进行国民党空军的情报、策反工作。张首光将我的政治思想情况向王月英同志作了介绍。不久，王月英同志便指示张约我去上海与她见面。

记得那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，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张镭突然从上海来到南京，约我一同出去玩玩。我高兴地说：

“是到中山陵？还是到玄武湖？”他说：“到玄武湖划船去吧。”于是，我们一起来到玄武湖，租了条小船，在湖中荡漾，船慢慢地划到对岸一片芦苇边，附近游船很少，非常僻静。他说：“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吧。”接着我们谈起了当时的国内时局和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，我对他说：“我真想到解放区去，但苦于无人引路啊”。他听后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曾对她谈过你的情况，你如决心参加革命的话，我愿意为你引见，如果今晚去上海，明天一早就可见到那位地下党的同志。”听了张镭的话，我真是又惊又喜，想不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将成为现实。说走就走，反正明天是星期天，没有什么事。当晚我们便乘上去上海的火车。

第二天早晨，车抵上海北站，出站后，我们坐上开往沪西的公共汽车，来到枫林桥。周围行人稀少，我们装成假日

郊游的样子，漫步桥头。当时正值早春，春寒料峭，可是我却感到身上有一股暖流……这时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走过来和张打招呼，我也停止了脚步，张即指着我向 她 介 绍说：“这位就是沈济世”，转而指着她向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李敏（王月英同志的化名）小姐”。张镭介绍完毕，对 我们 说：“你们谈谈吧，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了。”张镭转身离去，这时我才明白，眼前的这位李小姐，就是我所期待见到的共产党员。

我仔细地打量了她一眼，只见她留着齐耳短发，身穿海棠蓝的旗袍，朴素大方，像是一位小学教师。在她的提议下，我们走向附近的丰兆公园（现中山公园）。在公园内一片僻静的草地边，我们席地而坐，攀谈起来。她以亲切的语调询问我的出身、历史和家庭情况，我详细地回答了她的问话，她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个多小时，当 们讲完之后，她沉着地说：“在我们没有见面以前，我对你各方面的情况已有所了解。经过今天的交谈，对你了解得更深一步了。就我所知，有些青年原来向往革命，可是一旦当了国民党的军官，思想就变了，你已当了十多年的军官，能够始终如一地要求进步，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。所以，我很敬佩你。”她的话虽不多，但给了我很大鼓舞。接着她针对我当时急于想去解放区的心情说：“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，渴望到解放区去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认为真正的革命者，他的行动应服从革命的需要。革命需要他在什么地方工作，他就在什么地方工作。”听到这儿，我感到茫然，问道：“在国民党军队里能为革命做什么呢？”她看到我迷惑不解的样子说：“对！这就是我今

天要和你商讨的事。”她说：“中国有句俗话，叫‘身在曹营心在汉’，你现在虽然身在国民党军队里，但也可以为革命做很多工作。”她分析说：“根据你自己谈的，你在三八年军校时的一些老同学现在多是校级军官，有的在国民党军事领导机关，有的在部队里，都担任着重要职务。另外，你现在所在的国民党空军里，还有很多青年飞行人员。如果你把他们争取过来，站在人民一边，可以为我军提供军事情报或者驾机起义。”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这是有可能做到呢？我们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其原因有三：其一、你是他们（指国民党军队）培养多年的军官，对你信任的；其二、你们中的某些中下级军官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正义感，在我们进行教育后，他们有可能转变立场；其三、你有航空技术，可以一举成功，这是重要的条件。这些都是你开展策反工作非常有利的条件。你看，你留在国民党军队里不是没有工作可做吧？这比你单枪匹马一个人到解放区去，对革命贡献大得多吧？”她这样一席谈话，使我豁然开朗，好像我的眼前被什么东西挡住，被她一指戳破，使我看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，我深深地感到“与君一席谈，胜读十年书。”同时对她的高瞻远瞩，感到由衷的敬佩。于是，我当即心悦诚服地表示，放弃到解放区去的要求，服从组织决定，志愿留在国民党空军里，做我可能做的工作。她兴奋地站了起来，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说：“好极了！让我们今后在一起战斗吧！”

告别了王月英同志，我的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，脑子里思索着如何开展工作，浑身充满战斗的豪情，回到了南京城……

驾机起义

(一)

如何策反国民党空军人员驾机起义的问题，时时在我脑海里思考着，我想，如果控制一架单人驾驶的战斗机，争取一个飞行员，相对来说还是较容易的，然而我所在的部队是国民党空军运输大队，机种是美制C—46大型运输机，按编制规定机组人员有正、副驾驶员（飞行员）、领航员、通讯员（空中报务员）、机械员、仪表员等，如果执行空投任务，还配备有空投员等多人。因此，组织一架大型飞机起义，仅仅争取飞行员、领航员，固然是重要的，但是，这是很不够的。要保证驾机起义获得成功，除飞行员、领航员外，还要争取到一个通讯员。由他控制电台，在飞行过程中与地面保持通讯联系，用以欺骗对方，以免被发觉后，进行追击或拦截；此外，还要争取一个机械员，由他负责维修飞机，使之经常处于良好状态，保证可以随时使用。

起义的时机，也是一个重要课题。起义时机选择得好，可以事半功倍，轻而易举。否则，危险性大，可能功亏一篑。起义的最好时机是利用执行任务的机会，在飞行途中改变航向，举行空中起义，这是比较理想的，执行任务的机会是经常有的，但是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经常变动，不一定是我们争取过来的人。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？经过研究，终于想出了办法：这就是如果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中有我们的一部分人，对另一部分人，可以设法私自与他们周旋或借故

去某地有事，以乘客的身份登上飞机，加强我们的战斗力，以达到控制飞机的目的。以后的实践证明，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尽快争取空军人员，我们生活在国民党空军内部，深知其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，飞行员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天之骄子，为人所羡慕。但有些飞行员骄傲自大，目空一切，在与其他人员相处中，往往盛气凌人，因而形成飞行员与其他人之间有很大矛盾，飞行员之间也有矛盾。常言道：“文人相轻”，他们的飞行技术有高低之别，技术较高的人，往往看不起技术较低的人，而技术较低的人，心中又不服气。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也很普遍。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。有的不满现状，牢骚满腹；有的思想沉闷，情绪低落，如此等等，都应该成为我们注意物色和争取的对象，这些状况给我们做争取工作，带来了一定的有利条件。

国民党空军人员的思想情况也是复杂的，有一部分人，已经看清国民党大势已去，为了个人前途想另找出路，另外有一部份人有正义感，有爱国心，不满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。对这两部份人只要进行启发和诱导，是可以争取过来的。还有一部份人，整天吃喝玩乐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要做这些人的争取工作，还要经常陪他们逛咖啡馆、舞厅、酒楼等。总之，要根据不同的对象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。

我和张镭同志并肩战斗互相配合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我们终于争取到一批国民党空军人员。根据这个情况，上海地下党王月英同志认为，可以把争取过来的这批国民党空军人员组成二至三个机组，分期分批举行起义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我们争取过来的

飞行员徐骏英、魏雄英，通讯员赵昌燕同志奉命驾驶C—46型运输机一架，由上海飞往青岛执行空运任务。这是举行空中起义极为有利的时机，张镭借故去青岛有事登上飞机，起飞后改变了航向，一直飞抵济南解放区。那天，飞机是上午八点钟起飞的，当时我借故进入大队部的飞行指挥室，观察动态，约一小时后，扩音器里传来了对空电台的报告，说：

“飞往青岛的飞机发动机发生故障，准备迫降。”我知道这是张镭他们为了迷惑敌人向地面电台发来的假报告，当时指挥室的人员，为了飞行人员的安全感到忧虑，而我却暗自喜悦不已，为张镭等同志的起义成功而庆贺。

(二)

一九四九年一月汤恩伯奉蒋介石命令，率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，由常州进驻南京孝陵卫，成为国防最高军事指挥机构。汤纠集残部，准备组织长江防线，企图凭借长江天险，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张镭等同志在上海驾机起义，给了国民党刚开张的江防总部当头一棒，他们惧怕引起连锁反应，再发生空军驾机起义和陆军战场起义。因此，对起义消息封锁得很严，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，国民党军政人员闻之，个个垂头丧气。飞行大队的头头们，为了掩盖事实，在一次集会上色厉内荏自欺欺人地对我们说：“飞去青岛的那架飞机，因发动机发生故障，中途失事了”，我听了之后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张镭同志起义之后不久，地下党王月英同志又一次同我见面，对我说：“组织上经过研究，决定调你到解放区去工作。”我听了后感到很愕然，我想，一年前，我要求去解放

区未获批准，要我留下来搞地下情报、策反工作，现在为什么又突然决定调我回解放区去呢？但仔细一想，因为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那时，国民党力量还很强大，现在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组织上根据新情况作出新的决定，要我转移到解放区去工作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我问王月英同志：“你看怎么去呢？”王说：“要回娘家去，也不能空着手呀，应该带点礼物吧！”我莫名其妙地等待她说下去，她又说：“你是空中飞将军，从地面走回去，有失光彩吧！”啊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她是以幽默的语调和启发的方式，给我布置了新任务：“再组织一次驾机起义！”对此，我早有准备。几个月前，我就物色了102中队飞行员唐宛体，准备在适当时机同机起义。唐为人热情、豪爽，富于正义感，有强烈的爱国心，思想左倾。他在美国学习飞行技术期间，曾读过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报刊，由于我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较为密切，并暗自就如何驾机起义的问题，秘密地进行了商谈。经过反复分析，我们的结论是：利用夜晚夺取飞机，起飞后，先轰炸在南京的大校场和明故宫两个机场，当时这两个机场停有各种类型的飞机百余架，炸后飞往解放区。为了做好充分准备，我俩作了分工：唐负责争取机组的其他成员，如通讯员和机械员，并选择适当的飞机，我负责利用我在大队部二课的工作之便，设法窃取夜间登机证，取得合法手续。

一九四九年二月底，我在二课课长处获悉，国民党空军头头们对唐的平时言行有所怀疑准备将唐宛体抓起来，我经过三思，决定要唐迅速飞走，放弃夜间轰炸计划。如果行动

稍迟缓，将会产生严重后果。

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的上午，唐由台北飞来南京，准备下午去汉口执行任务，我们见面后我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了他。他对我们不能按原计划同机起义表示忧虑，担心地说：“我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”他唯恐我走不了，遭到不幸。他对革命同志的深情厚意，我是能够理解的，然而面对严峻的现实，我严肃地对唐说：“你不能再等了。再等下去，对方就要下手了。”他深感我对他情真意切，只好接受我的意见。这时他随即写了一封信，叫我到上海101中队找刁光弟，并把刁的情况向我作了简要的介绍，让我下功夫，争取刁光弟同机起义。这样，我们便在南京故宫机场依依惜别。下午，唐宛体同志和他的机组离开南京飞去汉口执行任务。当天夜晚，趁其他空军人员都到汉口市跳舞联欢饮酒作乐之际，唐率领机组人员，通讯员李学宽、机械员彭树新等同志驾C-47型运输机一架，在汉口机场举行了夜航起义，一举获得成功。唐的起义是在张镠同志起义之后的十八天之内，在同一个国民党空军大队内连续第二架飞机起义。就在唐起义的同一天，唐的同班同学王玉珂、余庆荣等同志驾蚊式飞机一架，也由上海驾机起义飞到解放区。

（三）

三月七日送走了第二架驾机起义的唐宛体等同志之后，我于三月中旬来到上海101中队驻地，准备秘密策反和组织第三架飞机起义，到沪后，我住在被我争取过来的段德济同志的宿舍里并向他说明来意，请他配合我的工作。

这次争取的主要对象是飞行员刁光弟了。刁和唐宛体同

志是同期同学，唐对刁的情况了解较深。据唐告诉我，刁的父母妻儿，均留在已解放了的北平，常有思乡之情。但是，这个人喜欢吃喝玩乐，生活不够严肃。因此，要争取他驾机起义，必须下大力气主动接近他。于是，我陪他一块出去玩，经常去跳舞厅、电影院、咖啡馆，或者下馆子吃西餐。就这样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加深了感情，建立了友谊。有一次我陪同他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聊天时，我故意告诉他，唐已飞去解放区，然后察颜观色，动之以心。紧接着，我以试探的口气向他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，没有立即答复，但观察他的表情，他在思索着什么。我又说：“我在大队部里听到一个传说，我们大队将要全部移驻台湾（我们大队的102和103中队，当时已由北平移驻台北了）。如果我们跟着去台湾，将来要想回来和家人团聚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”听到这里，他进入了深思。我点燃了一支烟，喝了一口咖啡，又慢声细语地说：“你的父母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无人照料，你能安心长期在外吗？再说，你的老婆这样年轻，她能无限期地等着你吗？”这几句话，触动了他的心弦，他嘆了一口长气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我看有门了，就乘机而入地说：“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事在人为啊！小唐已经给你作出了榜样，你可模仿他的办法呀！”他低头思索一会，猛地抬起头来问道：“驾机起义？”我说：“对！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你是驾驶员，飞机上了天，飞向何方，完全听你的指挥了。对你来说，并不困难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这个勇气。”他犹豫了一下说：“这得好好考虑。”这次谈话，暂告一段落。以后又经过多次促膝谈心，晓以大义，指出光明前途，刁终于

表示愿意驾机起义。但他又面带难色地说：“C-46大型飞机，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开走的。”我鼓励他说：“只要有决心，有什么困难我愿意帮助你。”他又提出：“我能开飞机，但没有飞机开，怎么办呢？”我说：“你如果真有决心驾机起义，飞机问题由我设法解决。但是，你要做好随时走的准备。”他点头表示同意。物色飞行员的问题解决了，机械员也是重要角色。我知道飞机的维修和加满汽油，保证飞机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出动，全靠机械员。而且飞机舱门的钥匙，也是由机械员保管的。因此，我必须再找一个得力能干的机械员参加起义。我看准了罗锡令。罗当时对现实不满，常为被国民党的飞行员看不起机械员而愤愤不平，牢骚满腹。我见机行事，给予启发诱导，说明这是国民党部队里不合情理的怪现象，并趁机告知解放军内部官兵如何平等相处，同事之间。不论职位高低，都是互相尊重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，罗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，终于表示，决心参加起义。罗为人正直，重义气，他又提出要我去做同机组仪表员宋元信的工作。他说：“我们走了，不能把人家丢下来不管啊！”我为了多争取一些人参加革命，便立即表示，接受他的建议，并先后做了仪表员宋元信、通讯员王凡（原名王伯泉）、机务员徐芳、机械员于振超等人的工作，向他们诉说旧社会的黑暗，提出国民党就要垮台，我们青年人必须另找出路，奔向光明。经过多次的启发教育，他们终于都表示愿意参加起义。

为了坚定他们的决心，经王月英同志的同意，我利用半年前在国民党空军大队部担任机要人事参谋时，掌管印信之便，为王月英同志取得了空军女职员的工作证。有了这个条

件，便请王月英同志直接到位于上海老靶子路的国民党空军新生社（俱乐部）来活动，与刁光第见面，在一起喝咖啡、聊天、谈心，以便更好地做好争取工作。

刁原是副驾驶，技术还不够熟练，要他当个正驾驶去操纵飞机的起落动作，他有些胆怯。因此，在与王月英同志谈话时对起义行动，表示出信心不足。当时，我有点急躁，想采取“激将法”，对他说：“生命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宝贵的，我不爱惜我自己的生命吗？但我敢坐你的飞机，你还不敢开吗？”刁听后面带愠色，在这紧急时刻，王月英同志急忙转言调解，对刁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，终于使刁平息了怒气，心悦诚服地表示：“争取时间，尽快行动。”

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的一天，刁告诉我，他接受了任务，要为联勤总部运送银元去长沙。我认为这是个机会，便和刁商定，在这次飞行中举行起义，把飞机连同满载的银元，带往解放区，作为献给党和人民的礼物。次日上午，大家乘车到了机场，准备到航行调度室办理起飞手续。此时得悉，长沙天气不好，机场关闭，不能立即起飞。一直等到中午，长沙天气仍无转变，乃回队部待命。第三天上午，再次去机场，得知长沙仍未转晴，正在下雨，就这样持续了六、七天。最后，空运任务被取消了，因而失去了一次良机，实在可惜！

一个月之内，在我们大队里，连续发生了两起驾机投奔共产党的惊人事件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，因而加强了防范。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，如果再拖延时日，夜长梦多，稍有不慎，很可能发生意外。根据这个情况和我们已经成熟

了的条件，我认为不能消极等待，而应该积极设法采取其他途径，以期早日成行。

经过反复思考，决定于四月九日下午四时采取强行登机的办法，举行起义。为什么要选定下午四时作为起飞的时间呢？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我考虑到，飞机起飞后，万一被当局发觉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能有两个：一是派战斗机拦截，但他们不知道我们飞行的航向和高度，要进行拦截，如同大海捞针，可能性很小；另一个办法就是派战斗机去济南追击，但是根据当时国民党战斗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的技术，飞到济南已是黄昏，便无法返航了，这样追击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，因此，这个时间最安全。

采取强行登机办法，比利用出公差的机会进行起义，显然危险性大得多。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接近飞机，搞得不好，就会自我暴露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终于想出了办法，即以“试飞”为名，骗取合法手续，从而登上飞机。主意拿定后，我于四月八日下午去找王月英同志，向他汇报和请示，以便确定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。王指示说：“降落地点可在距离蒋管区最近的济南，你们起飞后，我即和解放区联系，他们会欢迎你们的。”言毕，她和我热烈握手，预祝我们起义成功。告别了王月英同志，我便迅速通知有关人员做好准备。九日上午，我以消闲自得的样子来到值班室与值班员聊天、下棋。当值班员去厕所时，我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，冒充值班员给机场飞行调度室打了个电话，佯称一架飞机刚修好，准备下午“试飞”，并询问下午的天气如何。这就为下午的“试飞”打了招呼。但是，冒用值班员的名义进行工作，这是很危险的，万一暴露，将全功尽弃。为了防止发